

# 俄侨“第四浪潮”现象与思考

吴 嘉 佑

**【内容提要】** 俄侨“第四浪潮”以“九级巨浪”之势“席卷”欧美大陆,它不同于苏联时期的任何一次浪潮,侨民们以经济、种族、商业、劳务、留学等种种原因和自愿方式移居西方,其势头之大,人数之多,持续时间之长都是史无前例的,且问题的严重性日见凸显。虽然俄侨“第四浪潮”刚刚得以平息,但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到来,有人预测,俄侨“第五浪潮”即将到来。俄国政府如何面对这一棘手问题,全世界都将拭目以待。

**【关键词】** 俄罗斯 俄侨“第四浪潮” 经济移民 人才流失

**【作者简介】** 吴嘉佑,1955 年生,黄山学院文学院教授、俄苏文学硕士。(黄山 245041)

20 世纪 80 年代末,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后殖民的夹攻下,苏联解体,俄罗斯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领域全面被殖民,这个世人瞩目的“俄罗斯美女”遭到了“西部牛仔”的精神奴役和文化施暴。霎时间,俄罗斯大“家园”一片惊恐,成员们纷纷逃离这个精神栖息地。这就是一直波及当今的俄罗斯侨民“第四浪潮”。

说起俄罗斯侨民,人们自然会联想起 20 世纪原苏联时期经历过的三次侨民浪潮,它们构成俄罗斯历史、哲学、文化、文学及艺术等领域的独特景观。侨民中大哲学家、文化名人、大文豪比比皆是,俄罗斯文学的五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就有三位是侨民作家,侨民文学也因此与“本土文学”相媲美,成为俄罗斯文学的一大看点,更是文学和文化研究的一大热点。从历史层面看,俄罗斯历来就不是侨民之国,这是因为俄罗斯帝国时期的内部殖民统治起着巨大的作用,公民们可以在自由而又富饶的土地上安居乐业。然而,在历次现代化的进程中,在民族主义意识不断提升的同时,俄罗斯侨民现象日渐渐显。从 1861 年到十月革命前,大约有 430 万人移居国外,其中 260 万人于

20 世纪前 15 年侨居西方,其中大约 2/3 去了美国。可见,俄罗斯的侨民现象始于 19 世纪与 20 世纪之交。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和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俄侨“第一浪潮”(20~30 年代)也随之到来,大批知识分子被迫逃亡西方和中国(约 400 万);此后,“第二浪潮”(40~50 年代)中又有许多人从各地逃往非交战国(近 1 000 万);而“第三浪潮”(60~70 年代)则是在解冻之后一些持不同政见者因不满政治控制和压抑逃离原苏联(超 100 万)。从现实层面看,三次浪潮中出走的侨民近达 2 000 万,这一现象给俄罗斯的文化、经济和科技带来巨大损失,不能不说是极具负面影响的严重社会问题。

一般说来,“第四浪潮”始于戈尔巴乔夫年代,具体地说,始于他执政时出入境自由政策颁布的 1987 年 4 月,大批犹太侨民返回以色列。从本质上说,这一浪潮一直延续到今天,而且其数据每日都在更新。值得一提的是,有一点与前三次浪潮相同,那就是“第四浪潮”出境侨民的数据统计中包括了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但俄罗斯占大头。

如果说,前三次浪潮出走的侨民是出于政治

原因,那么,“第四浪潮”的侨民离开俄罗斯则多数是出于局势动荡或经济原因,故又称“动荡逃亡”( )或“经济浪潮”。20世纪80年代末,俄罗斯经历苏联解体和改革,国内局势很不稳定,国家前途一片渺茫,人们看不到前景,普遍产生失望、担忧和疑虑的心理,他们不得不把心思放在国外移民上。富人为了财产的保险和孩子的未来,能人为了赚钱和享受西方优厚的物质生活,学者则为了寻找高薪工作和心理平衡,还有劳力者则更是不择手段地(合法移民或非法偷渡)选择移民,凡此种种,归结起来基本上是出于一个目的,那就是为了经济利益。

可见,“第四浪潮”侨民与前三次浪潮的最大不同点就在于,侨民们受利益的驱动纷纷“离家出走”,他们以自愿的方式“背井离乡”。他们每个人都怀着自己的梦想,把异国当作天堂,放弃原有的理想去追寻所谓的新生活。因此,他们背负着“背离祖国和投靠敌人”的耻辱,大有可能遭人鄙视,尤其是遭“第三浪潮”侨民的歧视。以前的侨民基本上属于“政治逃亡”,从赫尔岑到列宁,再到高尔基,他们无不是出于被迫远逃国外,是为了避免政治迫害而不得不采取的政治避难。因此,他们往往都是些爱国者,肩负着某种使命,而且也自觉光荣,在国外期间不但受到欢迎和保护,心理上也没有任何压力。可以想象,“第四浪潮”的侨民到了异国他乡则要承受心理结构、心理适应、思维模式、生活方式等多层心理方面的巨大压力。难怪德国和美国专门设有俄罗斯侨民心理咨询站,而且心理医生只能是俄罗斯人。

“第四浪潮”侨民大致是这样几种类型,即种族移民、宗教移民、商业移民、高科技移民、劳务输出和非法偷渡等。

首先,种族移民和宗教移民是这次移民的主要类型,大约占出境人数的70%,属于种族移民的是从俄罗斯迁走的德国人,而那些迁回以色列的犹太人则属于宗教移民。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他们都属于回归本土,是德国人和犹太人还原国籍的延续。同样,他们恰逢此时选择回归无非也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为的是追求物质上的享受和心理上的平衡。

其次,商业移民虽然为数不是很多,大约不到10%,但问题的严重性很大。这些移民者大多是

富商巨贾,属于“俄罗斯新贵”,他们手中握有大量资金。为了确保财富的合法化和资金的资本化,他们通过移民来转移资金,以防不测。可想而知,这种所谓的商业移民对国家和民族的威胁显然不可忽视。

第三,高科技移民,这也是令俄领导人尴尬,令国民忧天的移民。不言而喻,高科技人员都是些科学家和高校教师,他们把握着国家的科技命脉,是国家的科技精英。他们往往都是国家派到国外进修的学者或攻读学位的高层次人才,一旦拿到绿卡,就意味着国家遭受双重损失。在科技决定一切的今天,他们移民境外才是真正的“人才流失”,其危险性不亚于任何经济流失。

劳务输出也是俄罗斯近年来移民形式的一种,它由多种人员构成,如技术员、工程师、普通劳动者等,他们出境的目的无非是为了获得一份白领工作或高额薪水,然而,他们一旦出去和站稳脚跟就会“乐不思蜀”,要不接走妻小,要不重新组建家庭,把包袱和难题甩给国家。工程技术人员的流失无疑也是人才流失,同样不可小视。

最令俄罗斯当局头痛的就是非法偷渡。由于政策开放,俄罗斯近年来的非法移民有增无减,移民者们利用探亲、旅游或偷渡等多种形式来达到移民的目的。令人难堪的是他们当中竟然有许多妇女,这也是俄罗斯当局不能想象和不愿接受的,因为她们大多数在境外从事色情服务,没有一技之长,只能以此谋生。

综上所述,无论哪一种类型,受益的是目的地国家,受损的只能是俄罗斯。欧美任何一个接受国早就做好准备,甚至以优厚的条件和承诺来接纳那些对他们“有用的”俄罗斯侨民,无需伯乐,“千里马”白送上门,何乐不为。而俄罗斯却始终独自吃哑巴亏。

与前三次浪潮相比,无论从侨民人数、人员素质、出境原因以及出境国来看,还是从选择国家、侨民出境心理、出境目的和侨民处境来看,它都是一种特殊现象。首先,这一浪潮的出境人数之多史无前例,规模空前。据俄罗斯内务部统计局统计(目前俄罗斯有两家统计局,一是俄罗斯国家统

计局,另一是俄罗斯内务部统计局,一般以内务部统计局资料为准),10 年(1991~2000)中从俄罗斯出走到德国、以色列、美国 and 欧洲各国的俄罗斯侨民超过 100 万。这个数字中不包含解体前定居在俄罗斯的,原属各加盟共和国出走的人数,尤其不包括那些二战以来长期居住在原苏联的德国、以色列和希腊等国的现在回归本土的侨民。此外,俄罗斯内务部统计的数据仅仅是依据官方发放的出境许可证来统计的,远没有把那些出境探亲、因公出境、留学和旅游而未回国的人数以及非法移民者计算在内。从规模上看,它虽然仅次于“第二浪潮”中离境的人数,但不难想象,这种和平年代的移民规模在世界移民史上或人类迁徙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而且这个数字仍然继续扩大。至今,估计接近 200 万,因此,有人把这一浪潮称作“九级巨浪”。且不管数字准确与否,百万人口流失对俄罗斯这样一个只有 2 亿人口的国家来说非同小可,它造成国家正常人口增减比例的严重失调。本来出生率和死亡率就严重失调,在加上这种“意外的”人口递减,这无异于雪上加霜。从某种角度说,它可能直接影响综合国力的下降,也是民族精神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具体表现。

其次,与前三次浪潮中的文化精英逃亡截然不同的,“第四浪潮”的流亡者当中相当一部分是科技精英。它的潜在危险性,在某种程度上要比前三次大得多。据俄罗斯网站公布的消息,这一浪潮的侨民中 20% 的人受过高等教育,具有劳动技能的人占 64.3%,而且还有在国外学习的大学生和研究生也成为侨民,因此有人说,这次侨民浪潮是典型的“人才流失”( )。殊不知,全俄受过和正在受高等教育的人仅占总人口的 13%,其中就有 20% 多的人流失。据悉,去往德国和以色列的侨民中 79.3% 的人都是从事科学和国民教育的工作者,仅 1996 年就有 11 万科学家到以色列定居,其中还不包括工程师。而谢苗诺夫化学物理学院两年内就流失 170 多位科学工作者,这对一个高校来说不能不说是一场灾难,同样,对一个民族来说也是一种不幸,尤其对俄罗斯民族来说更是一种悲哀。试想,俄罗斯人历来自命为上帝的托付者,扮演着担负拯救人类的使命,如今非但没能拯救全人类,结果却是如此。如果俄罗斯当局对此不加有效控

制,后果将不堪设想。

“新生代侨民”的首选国大多是德国,其次是以色列和美国,部分去了欧洲其他国家。这大概与侨民根基有着直接关系。原来定居在俄罗斯的德国人理所当然地回到德国,而那些犹太人更是天经地义地选择前往以色列,剩下的人则是为了经济利益去往美国和欧洲。这也表明,这一浪潮的侨民在选择入境国时更多考虑的是经济利益和生活环境,他们不得不为了生活和物质利益而“背井离乡”,其中大部分也是为下一代着想。正如他们当中 71% 的人所回答的:“为了孩子的前途”。不过,这种回答也未免有点冠冕堂皇,遮掩羞答而已,一方面因为国内局势不稳定和环境不理想,他们看不到自己国家的前途;另一方面,他们也羞于放弃精神文明,追求物质利益而为自己辩护,因为他们的移居不是因为政治所迫,不可能得到所有人的理解,更不会被具有传统价值观的俄罗斯人看好。然而,他们在国外的处境也未必理想,很多人找不到理想的工作且不说,那些移居德国的德国人,就连德国本土居民从心理上也不接受他们,认为他们不是德国人,而是俄罗斯人。可以想象,现居国外的俄罗斯侨民遭受歧视是必然的,尤其是那些非法移民的心理处境更是有苦说不出。而且据了解,他们与“第三浪潮”的侨民彼此之间很少来往,这就更能说明俄罗斯侨民问题历来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为经济利益而“避难”的侨民在西方除了对西方人有利可图之外,非但不受入境国本土居民的欢迎,而且也不被侨民前辈所理解。据赫鲁斯塔列娃(彼得堡大学博士)的调查结果,相当一部分俄侨至今仍未加入入境国国籍,其因由无非有两种:一是不被接纳,二是等待和观望,期盼能在民族复兴之日重归俄罗斯。这固然一方面说明他们仍持有爱国之心,希望自己民族能早日从困境中走出,以便重新融入俄罗斯大“家园”,但另一方面也应看到,他们的民族归属问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很可能悬而不决。这就意味着,作为一个社会人,他们将长期失去自己的社会属性,游离于社会和民族之外,处在一种漂泊的状态。对于一个现代人来说,这无疑是最具悲剧

性的结局。

俄侨“第四浪潮”始于苏联解体,先后经历过两次高峰,1993 年是第一高峰期,当时俄罗斯正处于苏联解体后第一次经济危机中,卢布急遽贬值,大批人长期失业,特别是“异乡人”(原苏联时留居在俄罗斯的“非俄罗斯人”)遭受不平等待遇,他们纷纷出境,寻找生活出路。这一时期基本上以德国人和以色列人回归本土为主。此后,随着出境政策的不断放开,大量的俄罗斯人和原苏联人纷纷开始“远走他乡”。1998 年 8 月,由于俄罗斯爆发第二次经济危机,加上总理人选走马灯似地换人,国内局势极不稳定,越来越多的人拥向西方,从而形成第二高峰期。从两次高峰期来判断,俄侨“第四浪潮”生成的根本原因在于俄罗斯社会的动荡不安和经济危机,并由此造成百姓生活水平急遽下降,甚至连基本生活也得不到保障,随之而来的是个体民族意识下滑,道德意识降至底线,精神支柱倒塌,正如索尔仁尼琴在 1998 年出版的《倒塌中的俄罗斯》一书中所描述的:“现在大家都承认,整个俄罗斯都被压扁了”。

从客观原因看,出国定居本无可厚非,俄罗斯历史上也不是没有侨民,但这种一浪高过一浪的移民现象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实属罕见。如果说,前三次移民属于“政治逃亡”,那么,“第四浪潮”则可以说是“经济避难”。政治逃亡者大多是思想精英,由于他们持不同政见而遭迫害,被迫背井离乡,但同样出于政治原因西方对他们的移民绝对给予支持和理解,他们为此感到某种政治自豪,至少在心理上不必承受太多的压力。然而,经济避难者却显然不被西方人看好,被认为是受个人利益驱动而主动背离祖国,他们在心理上要承受来自各方面的很多压力。前三次“政治逃亡”浪潮对政府和侨民来说可能是双赢,因为一方面侨民在境外获得政治自由,另一方面政府也少了许多政治敌对分子。而这次“经济避难”对双方来说则未必乐观,因为侨民们面对的是无家可归或有家难回的两难境地,虽然他们不是被赶出“家园”,而是自愿“离家出走”,但他们内心无不充满忧虑,就算顺利加入外国国籍,也少不了遭受歧视,精神上没有归属感。同样,政府所面临的是“人才流失”的社会压力和精英亏损的重大社会问题,它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要远比暂时的经济危机更加可怕。可

见“人才流失”大潮也要比海啸或洪涝等自然灾害更具危害性,更易于使人丧失信心,因为经济危机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有人为的因素,尤其最能体现政府的执政能力和管理能力。因此,有效遏制“人才流失”仅靠行政手段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改善经济环境和生活环境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最佳手段莫过于有效抑制经济危机的蔓延。进入新世纪以来,普京执政后俄罗斯“第四浪潮”移民现象得到有效控制,出境人数逐年下降,正是因为俄罗斯国内经济开始复苏,由此似乎可以说俄侨“第四浪潮”逐渐平息下来。然而,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俄罗斯在这次危机中再受重创,国内政治和经济重现种种不稳定因素,人们似乎已经远远望见侨民“第五浪潮”(此种说法尚未得到普遍认同)呼啸而来。这是摆在梅德韦杰夫面前的,也是令俄罗斯联邦政府头痛而又棘手的问题。

与前三次侨民浪潮的大批俄国文化精英被赶出“家园”相比,“第四浪潮”的俄国科技精英离“家”出走,这或多或少增添了几分悲剧性。如果说,前三次浪潮的俄侨在许多年之后满载着“归国精神”(赫尔岑语)之舟意外地扬帆归来,那么,人们能否期待若干年后“第四浪潮”的俄侨带着科技财富重归俄罗斯?这其中有许多变数。中国有句话言之有理,树挪死,人挪活,说不定哪天“第四浪潮”的大批侨民出人意料地衣锦还乡,荣归故里。当然,如果真有这一天,那倒不是一个意外。但愿“第四浪潮”的俄罗斯侨民能有一天像索尔仁尼琴当年回归俄罗斯那样,乘着火车,横穿祖国的东西部,日行千里,百感交集地投入母亲的怀抱。

(责任编辑 向祖文)

,1998 . . 3.

2008 .

## SUMMARY

**Sun Ji & Li Chunji** China's prosecution system i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Soviet one. The most salient manifestation of Soviet prosecution and supervision is general supervision and litigation supervision. The Russian prosecution system has preserved general supervision while annulling its supervision over criminal judicial procedure. This determines that the prosecution organ is no longer a legal supervision organ in criminal litigation, and that the complainant is on equal status with the defendant. Although China's 1982 Constitution explicitly stipulates the prosecution organ is a legal supervision one, yet general supervision has not been manifested ever since, as the limit is set for the exercise of prosecution power. China's reform on prosecution system should abrogate supervision over criminal judicial procedure, materialize clientele-oriented reform of prosecution organ in criminal litigation, and restore its general supervision outside the litigation area.

**Wu Jiayou** A billowy fourth wave of Russian emigration is sweeping across Europe and the Americas. Different from any during the Soviet period, it is unprecedented in momentum, numbers and sustained continuation, for economic, racial, commercial, labor or studying reasons and in voluntary form. On top of these, the problem is worsening. Though it has just been somewhat appeased, the fifth one is about to set in, some people are making such a prediction as a fall-out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The world is keen on how the Russian government is going to tackle such a thorny issue.

**Li Xin** Of all crises on major economies, the Russian one is the gravest, the article says, as it is spreading rapidly into economic entities from a highly liberal financial market. It is rather a production-related crisis than a financial one. It is manifested in imports from outside on the one hand, and in the volatile financial system and the outdated economic structure on the other. The root cause lies in the raw material-based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 economic liberation strategy and heavy dependence on external economic environment, especially on energy price fluctuations and external financing channel changes.

**Jing Weimin & Zhu Xinglong**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resulting from US subprime mortgage crisis has a tremendous impact on all countries. Russia is no exception. But how long the impact will